

大学之道

艺术教育:培养创新力的最佳途径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 高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人才培养要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和民族的稀有资源和希望所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and 人力资源强国的中坚力量。

大学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引领的高地。大学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培养大量高素质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也是实现理工科大学文化强国责任的重要途径。

学术、艺术须相互交融

当今世界公认的“拔尖创新人才”,从大画家、大科学家达·芬奇到酷爱绘画艺术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从诗人、物理学家牛顿到小提琴手、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从我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作者、地质学家李四光到热爱艺术的工程控制论和中国系统工程创始人钱学森,他们的成长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艺术的启迪以及学术与艺术的交融,他们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艺术所带来的无限想象力与创新人才取得成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国高等教育是由上世纪50年代文理工分立的前苏联办学模式延续至今的。受当时经济发展限制,理工院校基本上只强调对学生自然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教育,忽视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道德理性、审美价值、思想深度、法律意识以及法律观念的缺乏或淡漠,因而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随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确立,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文理兼容、艺术学术并包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全面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从人才成长的个人内在因素、教育过程、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考虑,需要多元化的刺激和激励,而艺术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最佳的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的途径。

艺术教育的作用不可替代

教育部在1996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艺术对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道德情操、培育全面发展的人,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

首先,艺术能够激发创新思维。这是因为艺术能够丰富人的想象力。想象是艺术思维的基本要素,也是对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要求。艺术想象力能够激发科学发现的灵感。同时,艺术赋予人更敏锐的直觉。艺术能培养人的观察力、感受力和领悟力,使人能在科学发现中捕捉细微,并获得别人无法感知的思想与变化。除此之外,艺术还能培养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形象思维是艺术创作和接受的最基本思维方式,它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艺术能够造就创新型人格。艺术领域崇尚标新立异、不拘一格、独抒性灵,最忌平庸。正如齐白石先生所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种艺术精神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就体现为一种创新型人格,即永远对未知的神秘充满渴望,永远像艺术家那样希望通过创新的作品来确证自己的独特价值。

第三,艺术沟通审美法则与科学规律。审美法则与科学规律之间存在着许多耦合。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相信描述自然界基本规律的方程都必定有显著的数学美,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妙的音乐之所以动人心弦,是因为它符合数学的规律,是数学和谐的反映。科学和艺术都恰到好处地用各自的方式描绘世界,艺术以其独特方式沟通审美法则与科学规律。

北交大的探索与反思

作为一所传统的理工院校,北京交通大学基于以上认识,长期把艺术教育摆在了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自1991年以来,学校就大力发展艺术教育。20年来,学校不断地探索艺术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中的新模式。

首先,坚持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第一课堂面向全校学生普及艺术教育。开设包括理论类、实践类、理论加实践类等形式的艺术类选修课,并确保每个学生在大学期间都能选上

“艺术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最佳的激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的途径。



至少一门艺术类课程,实现了艺术课程在我校本科生中的全面覆盖;第二课堂则推动艺术教育有深层次影响学生。发挥学生艺术团、文艺类学生社团的“领头羊”作用,广泛开展各种艺术实践活动,学生艺术团多次代表学校和北京市参加比赛并获奖,在繁荣校园文化、全面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努力办好零起点学生的艺术培养工作,发挥以点带面作用,推进第二课堂取得实效。

其次,坚持个性发展与全面成长成才相结合。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学生在艺术活动中发展个人兴趣专长,开发优势潜能。一方面,在校园舞台上涌现出一大批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并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的文艺作品,使参与这类活动的学生提高了美的创造力和艺术的鉴赏力,并从审美的愉悦和感情的共鸣中受到教育和启迪;另一方面,通过表达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个人修养的全面训练,在正确处理个人、集体、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保持个性、彰显本色,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

结合,在德智体美相互促进、有机融合中实现全面发展,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

最后,坚持艺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将艺术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高度融合,推出学生品牌活动,发挥教育的育人宗旨。学校学生艺术团于2002年在全国高校中首家推出大学生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十年来在校内外演出50余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艺术吸引人、凝聚人、感召人,而榜样教育又以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将二者有机结合,是形成学校开展艺术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和途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辛弃疾的著名词句。它诗化地表达了创作的过程中因寻觅导致发现、因苦思萌发顿悟的规律。对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样一条规律以及与之配套的方法同样也是适用的。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深入探索和积累经验。而理工院校是可以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培养。

编者按:不久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正式成立。学院下辖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学系、心理学系、经济学研究所、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等多个系所,而这些系所在其他学校一般都会以“学院”的形式出现。“系”、“院”的一字之差,折射出设计者怎样的思想呢?或许清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的思考能回答这一疑问。

学科壁垒限制中国大学发展

■李强

在阐述社科学院系所的设计思路之前,先提一件有些“老生常谈”的话题。

上个月,今年的诺贝尔奖公布,虽然莫言成为首个获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但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人的诺奖梦仍没有实现。为什么有着灿烂文化和众多古代发明的中国人,却迟迟没有重大的科技创新?为什么取得了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也没有人总结出一套成熟的高增长经济理论?

创新能力的缺失成为很多人诟病国内科研工作者的最大理由。而之所以出现此种问题,与我们的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曾经在英国的一家幼儿园看到这样的场景:绘画课上,老师用塑料桶铺满教室地面,让学生们围上围裙,然后放任学生随意作画,那个场景让我震撼。因为在国内,老师需要先把图画画在黑板上,再由学生一笔一画地模仿,就在这一笔一画之间,孩子们本应具有的想象能力便慢慢消磨了。

在之后的中小学阶段,扼杀学生创造力的方式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这里不必一一赘述。而当学生通过文理分科闯过高考独木桥,进入大学的校门后,他们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选专业。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外。美国大学第一年是不分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任何他想学的内容。而中国的学生则在他们对于专业没有多少了解的情况下,匆忙便选定了自己在大学四年的学习内容,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旧时的包办婚姻。

于是,大学的教育者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群孩子: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虽然成绩优秀,但明显缺少创新思维的训练,带着对专业的困惑与迷茫走进大学,走进一个个学院。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强调一下学院的重要性。尽管目前国内高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办了大量选修课程,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但由于课程性质不同,这类课程远称不上主流。学生的知识摄取依然以学院资源的提供为主。于是,“学院能教什么”对于学生的成长而言,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大学出现了明显的误区。

仅以清华社会科学学院为例,目前学院所设置的系所包括的学科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五个学科,还算比较广阔的学科体系。而在其他很多大学,这五个学科往往是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经济学院的形式存在。其

实,这样的学院设置多是在近些年发生的,各校纷纷出台“系所升格”的措施,好像是系所的地位都上升了,但造成的严峻现实是:学生的知识摄取被割裂了。

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远不是某个单一学科可以涵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面对问题时,更不能仅从一个学科的角度作出判断,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多重视角,而这种能力在学科十分单一化的学院里是无法培养出来的。

事实上,学科被人割裂的情况远不止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在我们的大学里,哲学系可以变成哲学院,中文系可以变为文学院,外语系变为外语学院,连汽车专业都可以变为“汽车学院”。

概念大学,概而言之,就是力炒概念。虽说早已有概念汽车、概念手机、概念房、概念菜等,但是最能炒作概念的还应该是概念大学。由于大学的得天独厚,所以炒作起概念来也是得心应手。

研究型:被拔高的概念

正当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苦于无路的时候,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为研究型大学——这一发现宛如及时雨,不仅提示了我们,同时也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我们。一时间,研究型大学成为最流行的概念;建设研究型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成为最流行的口号。然而,由于对研究型大学盲人摸象般的认识,时至今日,除却诸如“研本比”等一些人为可控指标可以和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相“媲美”甚至超过它们外,其余指标并没有太大起色。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专利,研究型大学并不都是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是按学校类型分类的,强调的是大学的性质与特征。它只是大学的一种类型,并不是一流大学的代名词。威廉玛丽学院、韦尔斯利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等,或许不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那样耳熟能详,但是,提起它们大名鼎鼎的校友,我们肯定不

会感到陌生:冰心、宋美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毕业于韦尔斯利大学;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里斯蒂安·安芬森、2004年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斯科特、2006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马瑟等本科均就读于斯沃斯莫尔学院……而这些学校都无一例外是教学型大学。

综合性:被曲解的概念

当从单科到多科、从多科到综合一度被认为是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路径的时候,“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等概念随之走红,建设“多科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多数大学趋之若鹜的口号。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多科性也好,综合性也要,不过都是贻笑大方之语。

从“大学”一词的本意来看,“大学”是拉丁文“universitas”一词的译名,其英文译作“university”。“university”词源上的含义为“普通的、全体的、通用的、多才多艺的”,《新英汉词典》对“university”的第一个解释就是“综合性大学”。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呈现出多科性。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大学的鼻祖,文、法、医、神

人乔布斯,这样一位科技精英竟然对佛教禅宗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苹果的设计理念上,便有着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理念。而乔布斯最初接触到禅宗就是在俄勒冈州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国内的学生能够在自己的大学里接触如此繁多的知识,原因很简单:目前我们割裂知识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

回到清华社科学院的院系设置问题上,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多领域的设置,让学生能够在多样化的学术环境下,尽量多地提升自己的综合知识储备,进而激发自己的创造力。但是,要想整体提高中国学生的创造能力,显然不是一两所学校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同仁,作出更多的努力。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大学要远离概念化

■翟亚军

为其基本架构;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现代大学的光辉典范,除却文、法、医、神四学科,哲学部涵盖了植物学、化学、物理学、地理学等领域;而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现代大学的旗舰,更是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于一身。所以说,无论作为概念的“大学”还是作为实体的大学,都显示出“综合”本身就是“大学”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大学发展的正常姿态,在“大学”前面冠以“综合”完全是画蛇添足。

单科—多科—综合不是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当然路径,多科也不是综合的初级阶段。在中国,单科性大学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是高等教育畸形发展的怪胎,重提建设综合性大学只是我们对大学建设正常轨道的一种回归。但是,或许是为了尽快与“单科性大学”划清界限,走出单科性大学的阴影,一时间,建设“多科性大学”、建设“综合性大学”等成为大学最响亮的口号,并且以最大的热情和前所未有的速度付诸实施。

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老老实实在建成的。没有老老实实在的态度和作风,纵然概念炒得再新,口号喊得再亮,也无助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达成。不然,当所谓的研究型大学、多科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离世界一流的距离似乎并没有被拉近。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其办学经费等全部由政府下拨。由于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一直以来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有限,伴随着大学扩招等特征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高校经费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为缓解大学办学经费紧张的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仿照国外高校的做法先后设立了教育基金会,其作用是为了多元筹集办学资金、促进学校发展。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吸引社会各界捐资办学,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根据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对中央财政设立的普通高校捐赠收入配比资金,用于对接受社会捐赠收入的高校实行奖励补助。对高校申报的货币资金单笔捐赠额在10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配比,不足10万元的项目不予配比。国家的资金配比政策仅适用于对各高校通过在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基金会接受的捐赠收入进行配比。换言之,要想获得国家的配比资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民政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基金会;二是社会捐款资金已到社会基金会账户。高校接受的仪器设备、建筑物、书画等实物捐赠,未变现股票、股权,以及长期设立的奖学金、基金运作利息等投资收入,都不包括在内。

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采取分档超额累退比例的分配方式安排配比资金,5000万元以内的100%配比,5000万元以上的50%配比。此政策暂定为2011-2013年有效,此后由中央财政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机遇难得,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利好政策的出台一下子激发了高校注册教育基金会的热情。刹那间,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目前“985工程”和“211工程”院校基本上都在国家民政部或省级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了教育基金,一部分有实力的地方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大学基金会的注册成立,为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受高校和政府部门重视。但是由于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时间仓促,与大学的很多关系尚未理顺,在操作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两个问题:

首先,独立法人属性遭遇体制障碍。理论上大学教育基金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非公募的民间公益性基金会。但实际上,大学教育基金会在校内却是一个处级行政单位,大学党委书记兼任法定代表人、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工作人员全部由校内事业编制的机关人员组成,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等都走校内财务账户,而且有些大学的教育基金会与财务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样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法人资格被完全淹没,基金会毫无活力可言。

其次,为“共谋”套取国家配比资金提供温床。由于国内高校长期以来的行政化办学思维,在学生培养等方面缺乏人文关怀,很多学生毕业后基本上不与母校联系,另外许多大学也不太注重与社会企业等的交流和合作,所以短时间内想获得大额捐款是件很难的事。因此为了获得国家的配比资金,有个别高校采用欺诈手段,找部分企业或者个人以虚假名义为教育基金会“捐款”,套取国家的财政配比资金,然后将假捐款通过隐蔽的手段退还给先前的“捐赠人”,据笔者观察这种“共谋”欺骗国家财政的行为在大学里有普及化倾向,并且也不乏触碰法律红线者。

相比较而言,国外大学的基金会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历史,尤其是哈佛、斯坦福等私立院校,教育基金会成立得比较早,而且运作也比较成熟和规范。在国外,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目的是使获得的捐款保值增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大学发展。教育基金会除了接受捐款外,还通过基金运作在低风险市场上进行投资,为了获得可靠的回报,大学教育基金会还成立了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聘请了专业的市场投资团队,并用合理的市场手段激励投资团队,所以大学教育基金会有很强的活力,通过投资等手段获得了高额回报,为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这与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为使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健康发展,引导其向专业化、规范化方面前进,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独立设置与运行。聘请专业的投机人员进行管理和运作,党委书记等校内人员不宜掺和其中,有必要时可以请大学校长等推动募捐活动,但总的来讲,校内干部和人员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基金会的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等各种开支由基金会独立核算,要与大学财务完全分开,避免糊涂账的产生。第二,完善配比政策。现行的财政配比政策过于粗放,不管是对大学的发展还是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而言都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造着新的教育不公平。因此建议细化配比政策,完善激励机制,加强配比资金监督力度,杜绝弄虚作假等行为。第三,推进信息公开透明。坚持公开、透明原则是基金会取得社会公信力的前提。因此,只有其所财务收支都能让社会公众以方便快捷的方式获悉,接受各个层面的监督,才能防止欺骗、贪污、浪费等行为,也才能保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长远发展。

大学教育基金会需规范化引导

■包万平 李金波